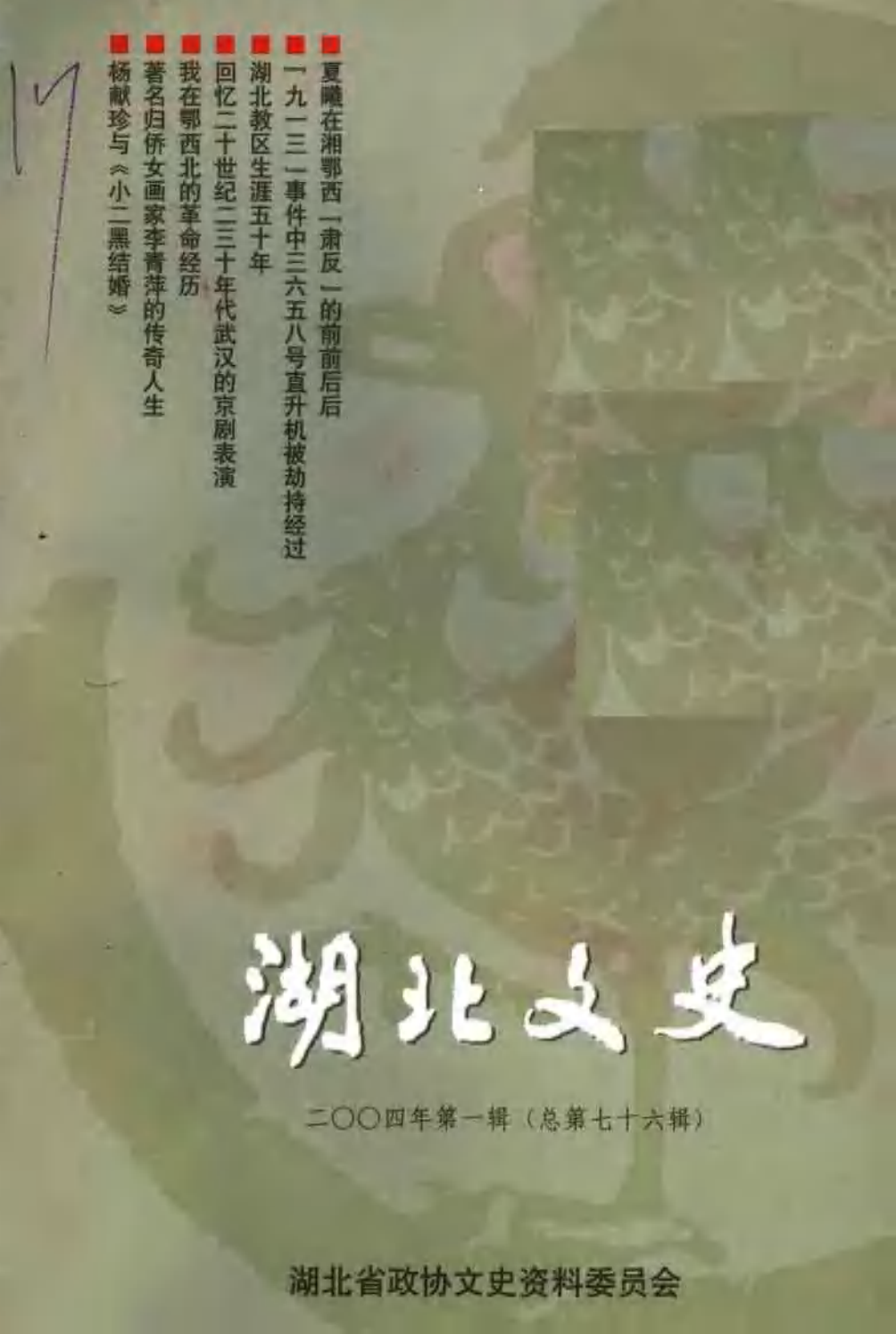


- 
- 夏曦在湘鄂西一肃反一的前前后后
 - 一九一三—事件中三六五八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 湖北教区生涯五十年
 - 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的京剧表演
 - 我在鄂西北的革命经历
 - 著名归侨女画家李青萍的传奇人生
 - 杨献珍与《小二黑结婚》

湖北文史

二〇〇四年第一辑（总第七十六辑）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湖 北 文 史 (半年刊)

2004年第1辑 (总第76辑)

主办: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 《湖北文史》编辑部

印刷: 湖北省政协印制室

出版日期: 2004年6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75千字

工本费: 10.00元

(2004) 湖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2092/SC号

目 录

时 代 追 踪

- 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前前后后…………… 孙维彬(1)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始末…………… 刘大中(20)
“九一三”事件中 3658 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康庭梓(39)

沧 桑 看 云

- 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在江陵附近作战的经过…………… 徐光宇(56)
湖北教区生涯五十年…………… 朱运广(64)

江 汉 寻 梦

- 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的京剧表演…………… 万澄中(79)
沔阳反“五风”经验推向全国…………… 陆华珍(97)

名 家 谈 往

- 我在鄂西北的革命经历…………… 李 实(103)

闻 人 聚 焦

- 王新亭将军在山西…………… 王腊成(152)
著名归侨女画家李青萍的传奇人生…………… 邱声鸣(164)

孙维彬

夏曦在湘鄂西“肃反”的前前后后

在轰轰烈烈的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是极其悲壮的时期。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疯狂“围剿”,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主力被迫进行七千里小长征、损失惨重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夏曦进行的四次“肃反”。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这些优秀儿女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葬送,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

事情“发生在1932年春天至1934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贺龙曾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文里沉痛写道。

湘鄂西苏区以洪湖为中心,由湘鄂边、巴(东)兴(山)(秭)归、鄂西北、襄(阳)枣(阳)宜(昌)等几块大小不等的根据地组成,创始人是周逸群、贺龙和段德昌。

湘鄂西苏区“肃反”是继中央苏区“肃反”和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之后的一场大“肃反”,持续时间之久、手段之残酷、杀人之多,比前两地“肃反”有过之而无不及。

笔者在搜集整理湘鄂西苏区革命斗争史料时,接触到这段惨痛的历史。在走访了一些亲历者和受害者亲属的基础上,撰成此

文,以供史家研究和参考。

夏 曦 其 人

提起湘鄂西苏区“肃反”,当年亲历的红军战士和苏区干群无不神情激动,心有余悸;提起夏曦,则无不为之变色。

夏曦,字蔓伯,1896(一说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早年曾为毛泽东校友。毛泽东称其“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1919年,他加入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不久与毛泽东、何叔衡、柳直荀等人在湖南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省学联干事部部长,柳直荀任评议部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时,在何键发动“马日事变”前夕,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让工农两会纠察队“镇静待缴”,自己却逃离长沙,省委自行解散。1928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成为王明宗派小集团里的“二十八宿”之一。

电影《曙光》里特派员夏曦的形象是:精瘦精瘦的身子套一件过大的红军军装,腰扎一根军皮带,干瘦的鼻梁上架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三七分头油光水亮,纹丝不乱。给人一种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这种不文不武、不伦不类的打扮恰恰是他的真实写照。说他是“武将”,他却根本不懂军事;说他不是“武将”,他却独揽军权,把贺龙排挤到一边,瞎指挥。“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执行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要游击战争,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说他是“文官”,却不守文官的本分,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一言不合,置人死地,全没有度量;说他不是“文官”,却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挥舞一根红蓝铅笔,指手划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手腕极其毒辣。

夏曦是如何到湘鄂西苏区来的？

1931年1月7日，在王明一伙宗派分子的压力和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支持和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依仗米夫的支持，强行篡夺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并把自己所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即《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作为党的行动纲领。王明提拔了一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其中以张国焘、夏曦等为得力干将，向全国各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路线贯彻到各个苏区和白区的党组织中去。

3月初，夏曦被作为中央代表，肩负执行王明路线的“重任”，被派往湘鄂西洪湖苏区。夏曦一到洪湖，借口批判李立三“左”倾路线，撤销了邓中夏红二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红二军团为红三军，军长贺龙。并命令邓中夏马上回湘鄂西首府瞿家湾，否则以违抗命令严肃处理。

3月27日，夏曦在瞿家湾主持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由他自任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掌党政军大权。为了加快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4月15日，在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中央分局成员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中共湘鄂西特委会议，形成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有严重“左”倾错误的文件。第二天，湘鄂西分局又作出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目前党的各级指挥机关，应自下而上地改造一次。在改造的当中，要能保证成分上的改善，和洗刷出官僚腐化分子。因此，在最近还要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这实际上是“肃反”的信号。

5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又作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案》。夏曦指责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特委执行了“富农路线”，强调“加紧反富农斗争”，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后

来在“肃反”中惨遭厄运。

6月17日，夏曦又召开扩大会，由各县县委书记参加，宣布撤销中共湘鄂西特委、成立中共湘鄂西省委。临时省委名义上负责日常工作，但实际上一切决定都由夏曦口出。临时省委只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

1931年夏天，湖北遭遇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水灾。洪湖苏区湖泊众多，河水暴涨。国民党军想利用洪水实行“水淹苏区”的计划，在监利县的上车湾、朱三弓等地掘开荆江大堤，使洪湖苏区顿成汪洋泽国，瘟疫大作，死伤惨重。

不久，国民党军又发动第三次“围剿”。面对水灾和“围剿”，夏曦束手无策，认为洪湖根据地很难巩固，应当“放弃洪湖”。当他的错误主张受到贺龙、段德昌等人强烈反对时，又矢口否认，说有人传错了他的意思。不料那人当即反驳：“我不敢假传圣旨，那是你的意见。”夏曦无言以对，思谋何时发动“肃反”，铲除这些异己分子。此时，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已开始进行“肃反”。

夏曦深感自己的步子迈得太慢了。

1931年9月，中共湘鄂西分局要正在鄂西北作战的红三军返回洪湖。贺龙率部在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的接应下到达襄北，两军会合后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战斗，沟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于10月上旬返回洪湖。夏曦蛮不讲理，指责红三军没有听从他的命令，立即赶回洪湖是“改变军事计划”，“企图脱离苏区不要苏区群众”，遂撤去会师后刚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的万涛的职务，由自己兼任。同时撤销各师师部，将部队缩编为5个团，直属军委分会指挥，一下子架空了红三军军部，贺龙的军权大大削弱，后经贺龙、段德昌、潘家辰等领导人的力争，才勉强恢复第七、第九两师番号。

夏曦到洪湖苏区，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后，积极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使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引起了湘鄂西广

大干部群众的不满。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夏曦正慢慢举起“肃反”的屠刀，等待时机成熟。

“肃反”之前

1932年初，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肃反”扩大化经验。夏曦隐隐感到“老兄”落后于“老弟”（张比夏小一岁），恐被王明批评，就加快了“肃反”的磨刀速度。于是，夏曦又掀起了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高潮。1月22日至30日在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夏曦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否定了湘鄂西特委的全面工作和土地改革的巨大成绩。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屈阳春表示反对。他郑重地说：“湘鄂西的党和政府以前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分田运动的政策也是为广大贫苦农民所拥护的，不然，湘鄂西这块地盘是怎么得来的？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摸索完善，但决不是什么‘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希望中央分局尊重事实，对党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屈阳春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们的欢迎，却惹恼了夏曦。他怒气冲冲地指责屈阳春是在反对党中央，是危险的改组派言论。

在会上，夏曦根本听不进代表们的正确意见，硬把“争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争取一两个中心城市”规定为湘鄂西党的中心任务。要求集中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倾向”，强迫红军打城市战、阵地战，进攻武汉等大城市。在经济政策和土地政策上，夏曦更是左得出奇，要消灭富农。他的这些错误主张遭到以省委委员万涛、省委巡视员潘家辰（克鲁）等为首的大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他们强烈要求撤销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势单力孤，十分恐慌，不得不匆忙宣布休会，派尉士筠（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赶赴上海请“尚方宝剑”。几天后，尉士筠带回王明的指示，夏曦喜形于色地重新召开会议，有恃无恐地强行通过了包含严重“左”倾错误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错误文件。“不仅全盘接受临时中央提出

的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军事战略,而且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夏曦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

夏曦把万涛、潘家辰、屈阳春等人的中肯批评说成是反党派别活动,是反对国际路线。会后不久,竟罢了屈阳春土地部长的职务。这位被贺龙称之为“江南农民运动的领袖”,半年后就被夏曦残酷地杀害了。

2月中旬,柳直荀(时任红二军政治委员、鄂西北临时分特委书记)才接到参加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立即扮成商人,取水路,从秭归牛镇上船,顺江东下,3月抵监利县周老咀。当他了解到党代会上万涛等人与夏曦激烈争论的实质后,旗帜鲜明地站在贺龙、万涛、潘家辰、段德昌一边,坚决反对夏曦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明确表示,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开展土地革命,巩固苏区,不能重蹈立三路线的覆辙。

柳直荀与夏曦共过事,深知其为人阴险。然而,耿直的性格,高度的责任心,使他义无反顾,敢于一捋夏曦的“虎须”。他的言行引起了夏曦的忌恨,埋下了后来遇害的祸根。此时,鄂西北独立团与洪湖独立团合编成红八师。夏曦怕放“虎”归山,干脆任命柳直荀为红八师政委,将他拴在自己身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伺机将其除掉。

4月,王明把持的中央(临时)听信夏曦的不实之词,几次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发来指示,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统统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机会主义两面派”对党、对党中央和国际路线的进攻。硬说湘鄂西苏区内部还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第三党”,“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夏曦接到指示,欣喜若狂,胆子更大了,立即发布《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全盘接受临时中央加紧“肃反”的指示和其他苏区“肃反”经

验,把红三军作战失利归罪于存在所谓的“游击主义”。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他终于举起“肃反”的屠刀。湘鄂西苏区顿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

一 次 “肃 反”

1932年5月,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开始。这次“肃反”来势凶猛,规模很大,横扫一切。从军队到地方,从高级领导人、指挥人员到士兵、普通百姓,被杀者不下2000人。夏曦首先拿万涛、潘家辰、胡慎己(红八师参谋长)等一大批党和红军领导人开刀。

“肃反”的开端很具讽刺意味,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5月的一天,红三军捉到一名国民党特务。他供认自己是国民党党员,潜来湘鄂西苏区的目的是与湘鄂西地方军队、游击队的某些人勾结,准备组织军事暴动。于是,夏曦急忙命令湘鄂西政治保卫局逮捕了有关人员。他亲自审问,采用严刑逼供,使这些无辜受冤者乱说一气。夏曦根据这些屈打成招的所谓“口供”,继续逮捕其他人员,一套十,十套百,牵扯的人越来越多。蒋特的反间计助长了“肃反”的扩大化,以至夏曦把作战中的失误,甚至提出不合他意图的建议的人都说成是“敌特”,“是别有用心心的破坏”。首先逮捕了胡慎己、潘家辰及其妻子庄东晓(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和万涛。

夏曦把胡慎己、潘家辰为工作方便而记录在本子上的干部、党员名单,都当成是“特务”、“改组派”的组织名单,按名单一一逮捕,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夏曦认定柳直荀从房县带回来的部队中的“反革命”很多,一次捕杀了这个部队的绝大部分干部,并给柳直荀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只是由于怕柳直荀揭他的“老底”而不敢马上对他下毒手。夏曦一会说过去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是柳直荀等人“抛弃苏区的阴谋”,一会儿又说红三军主力奉中央分局之命返回洪湖是柳直荀等人鼓动的“抛弃房县苏区的阴谋”。

夏曦为了欺瞒广大群众，胡说柳直荀等人是“国民党改组派”，“改组派”有个中央办事处，书记系柳克明（直荀），万涛为联合省委书记，后来，改组派书记移交彭之玉（红七师政治委员）。

庄东晓后来回忆说：“我和潘家辰一同被捕，从此互相隔离，再无见面。洪湖沦陷前夕，被作为‘改组派’分子关押在瞿家湾的一大批同志几乎都牺牲了。杀我时，因为敌人的马队逼近，来不及杀了，我才幸存下来。”

可怜一对两度留学苏联的革命夫妻，丈夫被错杀的确切时间和死时的情况都不清楚，更别说丈夫的尸首埋在何处了。整整30年后，贺龙在广州接见了庄东晓，告诉她潘家辰被夏曦杀害时的壮烈表现，称赞他是个铁打的汉子，是光荣的烈士。

在第一次大规模“肃反”中，还有一对夫妻惨遭毒手。他们是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栩栩和沔阳县苏维埃执委会妇女委员长石青。

1932年6月23日，中共湘鄂西省委在夏曦的高压下作出了《关于解散沔阳县委，开除栩栩党籍的决议》。当晚即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尉士筠带领湘鄂西警卫团，从几十里外的瞿家湾赶到峰口，包围中共沔阳县委机关，当场抓栩栩了栩栩、石青、沉沉、冯纯、郑重、邓耀等沔阳县委全部委员19人，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夏曦又诬蔑沔阳区委、支部全是由“改组派”包办，指责组织委员中除了鞠训仁，全都是假“肃反”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并把一批区委书记、支部书记调回瞿家湾一一杀害。

审讯栩栩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夏曦：“栩栩，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栩栩：“我为党、为沔阳县人民工作，何罪之有？”

夏曦：“去年8月，你组织领导灾民团到国统区去，干了些什么？”

栩栩：“采取合法斗争方式解决灾区人民粮食问题。共产

党干革命是为了老百姓，作为苏区县委书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人民饿死。”

这句话刺痛了夏曦。

夏曦一拍桌子吼道：“你这是影射中央分局！你要对这句话负责！”

栩栩：“我只对灾区人民负责。”

夏曦：“谁同意你与国民党政府合作？”

“经过沔阳县委全体委员讨论，举手表决的。”

“你这是勾结国民党的行为。我看你们全都是国民党的政组派！”

栩栩：“我与他们合作是为了抢修长江干堤，获得赈麦救济灾区人民。”

“获得多少赈麦？”

“除民工应得的以外，节约67万斤，全部分给了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

夏曦感到再问下去也难以定案，一挥手，叫几个政治保卫局人员把他拖下去，一顿毒打，关进了蚊虫肆虐的囚室。12天之后，栩栩被杀害。

栩栩被害之前，通过地下交通员夏明耀把绝命诗《殊途同归》送给外甥夏愚诚。夏愚诚回忆说：“1932年秋天，夏明耀又来了，从鞋子里取出一张十二句韵语的信（这是我舅舅最后一次给我的信），并郑重又伤感地对我说：‘栩栩同志不知为了什么事已被软禁，行动都不得自由了……’。不料三个月后我才得到噩耗，我舅舅竟惨遭杀害。但这十二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着：‘夏日可畏，事与愿违。心之忧矣，不能奋飞。一片忠心，难辨是非。成仁取义，殊途同归。寄语所思，莫恋甘肥。勤学苦练，趁此朝晖。’”

这首诗是对夏曦“肃反”的悲愤控诉，抒发了栩栩的革命壮志。

栩栩，本名许炎生，号美卿，沔阳人，是“湘鄂西四大文豪”之

一，被害时年仅29岁。

栩栩之妻石青，由于1931年6月在县委的一次扩大会上，讨论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问题，发言批评“左”倾错误路线，被夏曦认为有“改组派”的嫌疑，是“重要反革命分子”。6月23日逮捕她时即将生产，被拘押于瞿家湾，关押中生下一男孩，一周后委托一李姓农民代为收养。7月5日与丈夫同时殉难。儿子李为民，解放后参加工作，已去世。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肃反”运动，身为湘鄂西省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彭国才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浴血奋战的高级将领在战壕里被抓回来，说是“火线肃反”。省、县、乡干部只凭夏曦的一句话、一张条子就可能遭到活埋、刀砍、水淹、封口窒息（用湿黄裱纸、毛边纸一层层地封住口鼻，直至窒息而死）。

彭国才生性耿直，看不惯夏曦的胡作非为，反对夏曦借“肃反”之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陷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干部。他“胆大包天”，竟敢当面愤慨地指责夏曦：“开辟和发展湘鄂西苏区的党员、干部都成为反革命，只有你这个白面书生是红色战士？我看你是来找岔子的！”

夏曦恼羞成怒地撤销了他的职务，给他扣上“同情反革命，放跑被关押的改组派重要分子和高级干部”的罪名。7月，彭国才撰写《洪湖斗争血史》一文，连载于谢觉哉主编的《工农日报》上，借以批驳“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错误论点和作法。月底，夏曦下令逮捕彭国才，随即秘密处死。

夏曦大搞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省县区乡干部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加以残酷杀戮。

赵永树在《洪湖苏区“肃反”错杀两例》中记载韩翠娥老人的诉说：“我丈夫周天星当时是沔阳十一区区委书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32年5月25日中午，由兰松青、江坤将我丈夫逮捕，解押到湘鄂西省政府所在地瞿家湾，关在瞿生茂家中。我当即赶去打听

消息,有人告诉我说:他是‘改组派’。我去看望他时,守牢的人硬是不让我进去,说他是反革命,与国民党勾结。我听了万分悲愤,跪到湘鄂西省政府门前申诉,省政府的人都不理我。后来有个女人出来威胁我说:‘周天星是改组派,是反革命分子。你只有老老实实地把你丈夫所做的坏事交待出来,才能得到政府宽大。你再胡闹,连你也抓起来’。9月份,湘鄂西省政府撤出洪湖时,由夏曦下令,将我丈夫周天星和其他一些所谓‘改组派’,先用铁丝穿着锁骨带到指定地点,再用麻袋装着,用木船运到洪湖,抛到死眼沟淹死。”

当年的赤卫队长戴美伍回忆说:“戴灼弟是我叔叔,当时任湘鄂西联县政府秘书,由于彭国才是他入党介绍人,与我叔叔关系极好,彭国才被杀以后,我叔叔也被逮捕。1932年9月,被活埋于洪湖岸边的邓家台附近。”

第一次“肃反”大约在7月底结束。夏曦7月8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关于“肃反”的邀功报告里,开列的党、政、军、群众组织的黑名单就逾千人(谢觉哉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他能幸免,后文将谈到)。夏曦在报告里讨好王明:“反革命分子还多着呢,有的现在不便公布,我过去对‘肃反’太忽视了。以后更要加紧,一刻也不放松。”

这次“肃反”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造成群众与党、与红军关系疏远,甚至不信任,严重挫伤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感情,使他们人人自危,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害,最后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洪湖苏区丧失殆尽。

二 次 “ 肃 反 ”

正当湘鄂西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的时候,蒋介石任“剿共”总司令,命令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都以其左路军10万余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兼任司令官,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任副司令官兼总指挥。

1932年7月中旬,红三军主力在强敌进攻下被迫撤出襄北。8月上旬,徐源泉亲率3个师集中进攻洪湖中心区,形势十分险恶。

在“打阵地战,固守洪湖苏区”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都赞成后一种。而以夏曦为首的少数宗派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分子坚持前一种。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夏曦运用他的权力,悍然发动第二次“肃反”,借机把有不同意见的人都除掉。

戴补天,原名贵舒,湖北公安县人,曾随段德昌、贺龙转战大江南北,为创立洪湖苏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著名的游击战、运动战能手,作战骁勇;又是理财专家,一直跟随在贺龙身边工作,曾任湘鄂西农民银行行长,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财政部长。他不同意夏曦“打阵地战、消耗战,寸土必争”,“用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在一次会议上,他同夏曦争论起来,夏曦立即命令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江奇将他逮捕,诬为“改组派”。8月12日,戴补天和60多名“反革命分子”一起,被五花大绑押向瞿家湾附近的洪湖边,被强行推入湖中淹死,时年31岁。

张应南,洪湖人,红九师参谋长,足智多谋,与常胜将军段德昌珠联璧合,配合默契。岂料,一夜之间战将成了罪人。1932年10月,他被诬为“改组派”,遭秘密杀害,时年32岁。夏曦派人逮捕他时,段德昌泪流满面,无可奈何。张应南临死前曾给贺龙留下一张遗书:“第一,我不是改组派,夏曦专横跋扈,无人敢为我申辩,今后你要为我说直话。第二,夏曦大杀内部同志,是错误的,今后你要为我重申这个意见。以后不能再杀了。第三,不要忘记苏区人民,现在就要回洪湖开展游击战,革命才会有出路。”

张应南被杀害十多年后,家属才得知实情。后来贺龙为他说了直话,向中央军委、湖北省民政厅出具证明材料,证明他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

1932年9月中旬(中秋节前几天),由于红三军被迫执行夏曦

“死守洪湖，以阵地战阻击敌人”的错误指示，红军损失惨重，整个洪湖苏区中心区被敌人占领和包围，湘鄂西省政府、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失守。

早在第一次“肃反”之前就得罪夏曦，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扣上许多罪名的柳直荀，看到许多曾经出生入死与自己并肩战斗的指挥员都被捕、杀害，特别是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惨死，义愤填膺。他找保卫局的人辩论，写信质问夏曦。夏曦不仅不听他的劝告，反而诬陷他是“极端危险分子”、“改组派”，撤销了他在红军的职务。在瞿家湾失守的前一天，柳直荀突然不见，谢觉哉他们以为柳直荀因事外出了。后来才得知他是被江奇奉夏曦之命秘密抓走。后押到监利县周老咀，残酷折磨之后，于9月14日深夜被枪杀，时年34岁。

敌人逼近，洪湖苏区即将失陷，夏曦率部仓皇逃跑时，竟不忘处决“犯人”。枪毙来不及，就统统推入湖里活活淹死，一次就是上百人。尸体浮上来，漂满湖面，惨不忍睹，吓得沿岸渔民很久不敢出湖捕鱼。原来近3万人的红三军主力，撤出洪湖，到达大洪山时只剩下1.5万人，枪多于人，有枪没人背。连与党中央联系的唯一一台发报机也由于懂行的人被杀，无人会用，被抛弃了。

在此次“肃反”中被错杀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还有：

彭之玉 湖北江陵人，红七师政委；
段玉林 湖北石首人，红八师师长；
屈阳春 湖北石首人，江南农民运动领袖。

三 次 “肃 反”

1932年10月，红军冲出重围后到达大洪山，夏曦因丢掉洪湖苏区，怕受到中央指责和引起广大干群的反对，只得命令红三军进入鄂北山区漫无目的地往返游击。在枣阳县王家店，夏曦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假惺惺地总结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讨论部队行动方

向。

段德昌直言不讳地批评夏曦：“不懂军事，只知道蛮干。光要红军同数倍于我的敌人硬拼，结果把湘鄂西几万红军搞得只剩下一半人。‘肃反’把红军搞垮了，把苏区搞丢了。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夏曦非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我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办事。洪湖苏区失败主要是由于反对机会主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警觉性异常不够。”

在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时，段德昌认为应该恢复洪湖苏区。大多数领导人也表示赞同。但夏曦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信心，主张部队绕道豫西南转往湘鄂边山区。贺龙、段德昌极力反对。段德昌对贺龙说：“军长，我只要求将队伍交给军部，给我40条短枪下洪湖。三年以后，如果洪湖根据地不能恢复，红军队伍没有扩大，我提着头见你。”

夏曦将段德昌的言行视为反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活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慑于段德昌在红三军中的威望，不敢马上下手。

1933年1月，红三军经过7000里长途行军，越过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鄂川边境南下，辗转到达湘鄂边。红三军先后攻占了鹤峰和桑植城，减员很大，急需休整。盘踞在湘西的土著军阀陈渠珍慑于红军声威，表示愿意让出部分地盘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贺龙、段德昌、关向应表示同意，认为这样有利于红军休整，开展群众工作，恢复湘鄂边苏区。但夏曦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认为这是与敌人妥协，拒不同意，并强令部队向陈渠珍进攻。结果反被陈渠珍击败，红三军被迫退出桑植，返回鹤峰休整。

鹤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严重减员，不能久驻。段德昌和红九师广大指战员强烈要求回师洪湖。夏曦却把“打回洪湖去”的意见视为“改组派”企图分裂红军的阴谋，是破坏